

回程列車

影片介紹

在實驗紀錄短片《回程列車》中，臺灣旅居法國的導演黃邦銓，並置了「我」和「他」兩人的故事：影片中，「我」（也就是導演本人）搭著火車，從法國一路旅行到中國廈門，而「他」所出身的國家，影片一開始並未說明，只告訴我們「他」經歷拉伕、逃兵、飢荒與逃難的命運，在混亂的年代，從家鄉來到一座陌生的島，並且在港口與兄長走散，再也沒有找到兄長。

影片後半揭曉，「他」是導演的爺爺，家鄉在中國，陌生的島指的是臺灣。這是1940年代的故事，「他」所經歷的事件，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戰（簡稱二戰）、國共內戰、二二八事件等。「我」也透過旁白告訴我們，「他」一直到離鄉四十幾年後，才終於回到家鄉。

在影像上，「我」的故事，對應的畫面是由旅途中的圖片，「他」的故事，則是圍繞著老照片。老照片中，一位青年梳著油頭、穿著用辛苦賺來的工資買下的好襯衫，在自己工作的工廠前請同事拍照。青年原先是想將這張照片寄回中國的老家，向母親報平安，說自己一切都好，但這張照片卻沒有機會寄出，因此塵封在「我」的老家，成為這部片的源起。

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，這部影片直接涉及的議題，是關於外省族群逃離中國、倉皇落腳臺灣下，種種社會創傷的療癒，以及不同歷史記憶的對話——在過去威權統治期間，不同族群的人們，很難訴說自己的痛苦，遑論互相對話、彼此理解，後來甚至一度反而互相仇視，至今仍有許多互不了解之處，而像本片這樣的作品，正是訴說創傷經驗的嘗試。

背景介紹：臺灣的「外省人」

《回程列車》片的背景，是後來在臺灣被稱為「外省人」的這群人，在 1945 年後遷移的歷史。這群人一部分是在 1945 年二戰之後，以及 1949 年中國發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內戰背景下，因國民黨敗退而隨國民黨來臺的軍民。劇中的「他」是在 1949 年之前就已經因為貧困而遷移到臺灣，但臺灣外省人的大宗，是 1949 年時因為中國國民黨於國共內戰敗退，選擇或被迫跟隨蔣介石政權遷移到臺灣。

與「他」境遇相同的人，大致有多少呢？截至 2023 年都沒有確切的數字，而這是因為戰亂期間，出入境管制相當混亂，並沒有可靠的官方登記。我們只知道，根據 1956 年政府舉行的人口普查，當時全臺灣的外省人平民（不含國軍官兵）約有六十四萬人，其中約三分之二居住於都市（影片中的「他」居住在基隆市就是其中一位）。至於算入軍人後有多少人則有爭議的，過去的研究者如范堯盛、馬一龍經常認為總數為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，但一些學者如高格孚、楊孟軒、葉高華等人認為這是相對高估的結果，因為逃亡期間，國軍有許多逃兵，登記的人數因此並不實際，最保守的估計（楊孟軒）認為來臺的外省人約略低於一百萬，而亦有論者（葉高華）則認為約為一百一十萬至一百二十萬左右。

影片中的「他」在港口與兄長失散，在當時，這是相當常見的狀況。歷史學家楊孟軒在著作《逃離中國》指出，戰後的《中央日報》分類廣告頁面，經常出現「尋人啟事」，找尋失散的家人、朋友，有時一天甚至會刊出十幾則。

雖然不是每個外省移民都與親人失散，但是，更進一步說，影片中的「他」在臺灣無親無故，這在當時也是常態。楊孟軒形容這群外省移民多數「一無所有」且「原子化」；所謂的「原子化」，指的是這些人來到臺灣

之後，通常沒有家人、朋友所組成的人脈支持，而是孤身一人。也因此，影片雖然沒有拍到 1950 年之後的事情，但歷史研究顯示，到了 1950 年之後，像「他」一樣的外省人大量在臺灣設立同學會、同業公會、同鄉會等組織，正是為了試圖建立支持網絡，解決彼此孤立無援的狀況。

探討議題：外省族群的離散、逃難與創傷

本片最直接呈現的創傷，是外省族群離散與逃難的傷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的逃難故事並不是從逃到臺灣那一刻才開始，相反地，許多像「他」一樣屬於社會階級底層的外省人，在中國時期就已經不斷經歷戰亂、貧窮與出逃。在「他」的案例中，他在來到臺灣之前，就已經有被迫從軍因而被迫離家的經歷——「他」是一個不斷經歷戰爭、不斷逃難的人。

本片並未直接拍出「他」逃來臺灣之後如何想家，但有提到「他」到四十年後才能回鄉。許多人都曾提到，外省第一代最重要的創傷，就是與家人分隔兩地、不能互相聯絡的痛苦。國共對抗下，不僅實體的探親不可能，連通信都受到《防制在臺定居國人對匪區通信及經由海外潛往匪區實施方案》等政策禁止。值得補充的是，《逃離中國》一書提到，外省人在 1950 年代前後，受到蔣介石對內提出「一年準備、二年反攻、三年掃蕩、五年成功」口號的影響，普遍以為自己過一段時間就能回鄉（畢竟，許多像「他」一樣的外省人，在先前的戰爭中也都有逃亡的經驗，後來也能重返故鄉）。

他們因此抱持著強烈的「過客心態」，無意融入臺灣社會（許多甚至因為厭惡日本，連帶鄙視過去曾受日本殖民的本省人）。一直到十年後的 1958 年，《中美聯合公報》的內容已經顯示國民黨放棄武力反攻，外省族群才普遍意識到自己可能回不去家鄉，回鄉的希望粉碎、幻滅，當時一些觀察家提出，外省人自那時開始深受打擊，普遍抱著「空虛寂寞」的心態。

此外，由於許多外省人思鄉情切，因為想和家鄉聯絡，成為政治犯。

另外，外省人的普遍孤立，也造成了一些社會後果。比如楊孟軒就指出，1950年代，外省人的自殺率比本省人高出許多，而犯罪率也一度來到本省人兩倍，臺大醫院的資料也顯示，外省人因為精神疾病就診的比率也比本省人高，這些都意味著無依無靠下人們絕望或失序的狀態。影片中的「他」很快就找到工廠的穩定工作，但許多這些外省人並未找到工作，又沒有依靠，便成為在路上遊蕩的無業男性，不時搶劫、偷竊，甚至侵害一般民眾，在當時的報章中被稱為「散兵游勇」。

也值得補充的是，如同影片中所說，四十年後，「他」和其他第一代外省人終於回鄉（這也是民主化的成果：外省老兵何文德等人自1986年起發動抗議，展開「老兵返鄉運動」；1987年，蔣經國解除赴中旅遊禁令）。但是，返鄉不是創傷的終結，反而是另一波創傷的開端：他們發現自己的家鄉面目全非，跟記憶中完全不同，中共治下家鄉景貌大變，而家人即使未死、也可能人情淡薄——第一代外省人發現自己不是「有家歸不得」，而是真正的「無家可歸」，這又帶來另一波的創傷。

聚焦臺灣：外省族群面對的國家暴力

面對政治議題、尤其是轉型正義，許多人並不愛討論「族群差異」。這或許是因為1990年代臺灣政治的族群紛爭，使得一些人仍活在當時紛爭的歷史陰影之下，也可能是因為人們普遍對於實際上的族群狀況不夠了解。但其實，討論族群差異並不是為了掀起仇恨，而是為了更了解不同群體的歷史記憶與傷痛，也更能夠反思這些記憶與傷痛殘存的影響。

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，是本片如何討論二二八事件。片中說：「軍艦回來了，但不是為了我們，是為了屠殺那些講不同語言的人，但在這個黑夜，士兵們才不在乎殺了誰。」二二八的「族群」面向，並不像坊間一

些簡化的說法，只是查緝私菸引爆族群衝突。相反地，政府在三月派遣軍隊鎮壓，才是造成許多死難以及恐懼的緣由——而對像「他」一樣經歷二二八的外省人而言，國家、軍隊並不是為他們服務（「軍艦回來了，但不是為了我們」），軍隊並未真正「保護」外省人，並非前來維持和平，而是也對外省人帶來恐怖。

對上述議題有興趣的讀者，可以參閱小說家李渝的短篇小說〈夜琴〉，同樣寫到外省族群在二二八期間面對的危險與恐懼，裡頭寫道主角恐懼於「戰爭並沒有結束」，感嘆「戰爭，戰爭，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戰爭」，正是飽經戰爭流離苦難人們的心情。這也是未來討論二二八的真相與遺緒時，可以持續注意的重點。

此外，也有許多的外省人受到政府打壓而淪為政治犯，這點與「外省人受到政府制度性優待」（比如在公務人員任用上有名額保障）兩者同時存在，並不衝突。根據統計，政府所補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中，有超過四成是外省人，但外省人只占臺灣人口比率約一成至一成五，這意味著，外省人成為政治犯的整體比例可能比本省人更高（而且這個數字可能是低估的，因為早期許多外省人隻身來台，未必有家屬能夠在數十年後出面申請賠償）。這或許是因為，1950年代，白色恐怖最嚴峻的時候，案件是以左翼、共黨案件為主，而外省人由於與「大陸」人士的人際網絡牽連，更容易涉入共黨相關案件。

更廣泛地說，族群差異至今仍然存在，這些年來仍有政治人物公開挑動族群仇恨，而網路上、私底下仍不時會有關於族群歧視的發言。如何讓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獲得理解？如何讓大眾明白「外省人」並非僅是歷史名詞，而是活生生的人們，並且進一步同理、討論他們的歷史創傷，才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。這些相互不理解的鴻溝又該怎麼填補？這是臺灣面對的政治事實，轉型正義的目的並非撕裂族群，然而一味迴避也無助於對話

——真正的和解與共生，必須建立在互相理解與溝通之上。

延伸閱讀：

楊孟軒（2023）。《逃離中國：現代臺灣的創傷、記憶與認同》。臺北：
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。